

历史上深圳地域与海上丝绸之路渊源初探

王元林¹,熊雪如²

(1.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000;2.深圳市宝安区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600)

摘要:历史上深圳地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军事、交通、人员往来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渊源主要表现在:深圳地区控扼江海要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必经之地;海上贸易制度不断调适,是中国外贸制度先行先试之地;海洋经济特色鲜明,中外商品交流频繁;是驻军重镇,为海上交通的保障与海防要地;中外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不断,是佛教海上南来首地、“辞沙”文化的主要形成地和华侨华人的祖籍地。

关键词:深圳地域;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贸易制度;中外商品交流

中图分类号:F 127.9;K 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3-0020-05

早在隋唐时期,深圳地区^①所在的珠江口东岸就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与港口,其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经济、文化、军事、交通、人员往来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深圳的历史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而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也和深圳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对深圳地区(即明代新安县、建国后深圳)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特征及作用加以分析和总结,以期为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做好注脚,为大力发展湾区经济提供有力的历史支撑与文化动力。

一、深圳地区控扼江海要道,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海必经之地

历史上,深圳控扼江海要道,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口岸、航线必经之地,是海船“辞沙”之地,是中外商船离岸的最后停泊地。《汉书·地理志》详细地记载了从中国南部沿海南向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

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汉代沿南海西岸航行,今深圳地域时属番禺县管辖,“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②,其中深圳地域为航道所经的珠江口东岸,地位重要。

从东晋设立东莞郡宝安县(指今深圳南头)开始,政府加强了今深圳地域的人口与行政管辖,深圳地域在中外交通与贸易中已崭露头角。东莞郡的盐、蚝等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中外交通与贸易的作用,是政府设立管辖机构的初衷。处于珠江口东南的宝安县是广州东莞郡的首县,为中外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线路所经,是广州海上交通航线出珠江口后,西线经宝安离岸后,经过海南岛东部七洲列岛,进入南海诸岛,远及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重要节点,也是六朝时期海上交通与贸易的重要地区。部分贸易从东线,经宝安,通往粤东、闽浙,甚至远及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一时期,宝安县成为广州海外交通的前哨站。

在唐代广州“通海夷道”中,屯门为重要节点。屯门指今深圳南头、香港西部屯门地区。《新唐书·地理

收稿日期:2016-02-22

基金项目: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资助项目“深圳与古海上丝绸之路渊源研究”

作者简介: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历史地理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熊雪如,经济学博士,深圳市宝安区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行二日,至象石,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同时屯门地区扼珠江口外交通要冲,外地船只只会先经屯门地区,然后北上广州进行贸易。从唐代开始,屯门成为中外商贸必经之地。当时珠江口东侧有一条沿着佛堂门、急水门、屯门、南山,经过南头城、虎头门进入珠江而直抵达广州的深水航道。唐朝广州“通海夷道”必经屯门附近,由于宝安县为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途和关隘要塞,宝安县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桥头堡,其在广州对外贸易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广州的外港^[2]。

宋代,由大食国(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和以西的红海沿岸国家)经故临国(今印度半岛西南端的奎隆),又经三佛齐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达上下竺与交洋(即今奥尔岛与暹罗湾、越南东海岸一带海域),“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广州)者,入自屯门(今香港屯门、深圳南头);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今陆丰甲子港)。”^[3]这条主干航线除了向更远伸展之外,还有许多支线。

秦汉航线和道路的形成,为以后海上航线和陆上道路奠定了基础,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其后各代,道路在此基础上有所延展。深圳地域北上的东江道,可以通过北江、章江,联通惠州、赣州;通过北江,联通韶州、连州,北上再经赣江、湘江,联通长江流域;通过西江,联通肇庆、梧州、柳州、邕州(今南宁),甚或联通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地区,腹地范围广大。而对外,随着交流的扩大,屯门从唐代就成为海外贸易广州港的外港,不仅可以到达南海沿岸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南亚、西亚、东非,到明代,随着大帆船贸易进行,已经可以绕道好望角,到达西非、西欧,甚至越过太平洋,到达美洲^[4]。其间,深圳地域的交通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从明代开始,深圳的赤湾成为“辞沙”离岸之地。永乐八年中贵张源出使暹罗,于赤湾建立天妃庙。此后,“凡使外国者,具太牢祭于海岸沙上,故谓‘辞沙’。太牢去肉留皮,以草实之,祭毕沉于海。”^[5]去暹罗、占城、满刺加等外交事项,深圳赤湾都是重要的海上交通节点与桥头堡。明清时期,南头、赤湾是深圳重要的海上丝路遗迹。“而新安赤湾天后庙,为省会藩篱之地,扼外洋要害之冲,护卫虎门、澳门,以作保障;汇东北诸海,以为归宿;外而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番舶来颺,莫不经由于此,然后就岸。”^[6]这里成为中外使节停船祭祀的重要场所。

二、海上贸易制度不断调适,中国外贸制度先行先试之地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深圳地区的贸易体制也不断完善,历代朝廷对海洋贸易的管理体制都在珠江口先行先试,使珠江与南海贸易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外贸体制的基本成形发生在唐代,这一时期,唐朝政府在广州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7]。南汉国设置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押蕃使”等官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北宋熙宁九年诏诸舶皆隶于广州舶司,并在熙宁中改市舶法,各地卖海外者往复必诣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调整,大大提高了广州在外贸体制中的地位。元丰《广州市舶条》又颁行闽、浙,成为全国性贸易法规^[8]。这一时期从唐代创立的市舶使(院)制,宋元时期推广到东南各港,宋市舶贸易虽以广州为重,但屯门作为广州外港,中国外贸制度得以在此先行先试。

明初,实行朝贡体制(勘合贸易),南海诸国朝贡主要通道在广东,不许民间进行商舶贸易,严禁私自出海“通番”。明中期开始,由于殖民者进入,中国外贸体制的重大变革首先在珠江三角洲展开。葡萄牙人在明中期率先进入广东屯门海域,叩关求市。这一时期商舶贸易迅猛发展,明代规模小且诸多限制的朝贡贸易体制受到强烈冲击,东南沿海各省的贸易制度逐步调整转型。以广州、屯门为代表,制度先行先试,在广东特别是珠江口首先实行这一转型被统称为“广中事例”。开始时,屯门海域的南头形成了“南头体制”(“屯门体制”),构成广州——南头两种体制并存格局。广州城内要持有明政府朝贡贸易使的勘合即许可证,才能进行贡舶贸易(市舶贸易),没有勘合的,也即非朝贡的商舶贸易则可在南头进行,这已得到地方官府默许并公开实施^[9]。南头税制形成的抽分方式为地方官府带来了巨额财富。这种权宜性的贸易规则使得澳门开埠后,中葡贸易通过“澳票制”便转化为澳门与广州间的贸易,并得到了朝廷同意,由此上升为“广中事例”的组成部分。以税收征管为中心,以开拓财源为目的的广东商舶贸易管理体制,与一年两次的广州“交易会”共同构成了“广中事例”,从而为中国建立了一套适应于贸易转型的管理体制^[10]。“广中事例”这一海外贸易体制在清前期得到不同程度地保留,并在乾隆广州一口通商后迅

速发展,特别是对后来的粤澳贸易和粤港贸易体制发展以及设立十三行等产生了重大影响^②。

总之,各朝外贸体制改良或改革总是在珠江口先行先试,然后推广至其他口岸,其中明代后期南头(屯门)就是先行先试的实践地。南头形成的“南头体制”随后发展到中葡贸易“澳票制”,最后上升为中央默许的“广中事例”等这一系列外贸体制的变革,为中国海外贸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三、海洋经济特色鲜明,中外商品交流频繁

深圳地区背山面海,本地海洋经济主要从事采珍珠、晒盐、养蚝、捕鱼,以及与外贸活动有关的莞香。因此历史上,这里为盐民、渔民、蚝民、疍民、珠民与香民(种植采割香树)等集聚之地,商贸经济发达,海洋经济特色鲜明。这些海洋经济与贸易构成了深圳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三国东吴时,盐业发展迅速,当地政府在深圳南头筑司盐都尉垒,管理盐业生产。两晋时,深圳地域海岛上出现“卢亭”或“卢余”疍民。唐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卢亭者,卢循背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唯食牡蛎,垒壳为墙壁。”南汉时,由于采珠业的兴起,政府设立“媚川都”采珠场,采珠逐渐成为历史上深圳地区海洋经济的重要代表。宋元丰时,东莞郡盐场规模发展壮大,深圳地区境内有东莞盐场(今深圳南头)、归德盐栅(今深圳沙井)、黄田盐栅(今南头东北及东南)等。北宋末至南宋初,又增加叠福盐场(今深圳龙岗叠福)、官福盐场(今九龙半岛东部与北部)等。两宋时深圳地区盐场数量达到五个之多^③,可见其规模之大。盐业经济无疑成为港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采珠与盐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对内外商贸发达,港湾经济名重一时。明代时,香料贸易成为港湾经济的重要内容。深圳、东莞等地盛产莞香,莞香多由九龙尖沙头落艇,运往港岛西南今香港仔东端一个小港湾,使得其后名闻遐迩的香港由此得名,可见莞香的对外贸易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之大。这些历史时期深圳地区的海洋经济,为深圳商贸经济的活跃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

正是新安县捕鱼、盐业等海洋经济发展以及莞香种植业逐渐兴盛,促进港湾经济从沿海向境内商贸集市发展。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县有市7个,墟23个。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新安县有市7个,墟29个,其中有11个墟是新增^④。墟

市分布大多在沿海西部、南部以及内部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新安县城所在的西部地区,为贸易密集地区所在。嘉庆二十五年(1825年)松岗墟《重建义和墟关圣大帝古庙碑记》开列各堂、馆、店、栈、渡口等共121个商号捐资名单,可见其商贸活动的活跃。各墟市参与商贸活动的商家不局限于本地^⑤。南头道光年间的《重建观音阁碑记》所列捐资者中,有来自省内外的商家,其中有湖南、高明、六约、香港、九龙、深圳、元朗、平山、西乡、夏村等地的商人。外地商家为保护其在新安县的利益,在南头成立会馆、商会、会所等组织。如在南头城的商号裕记、恒记、允记店、恒益店、华合后、裕隆店、王佐君、永益店、王灼华、联泰店等^⑥。据清尤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二统计,道光年间(1821—1850)新安县的商业捐饷占30%。从商人向封建政府所负担的捐饷比例看,说明当时的商人是为数不少的。由此可见,历史上深圳的港湾经济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基础,它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扩展并逐步壮大,成为今天深圳发展湾区经济、建设21世纪桥头堡的历史源泉。

四、深圳地区是驻军重镇,为海上交通的保障与海防要地

深圳地区历来为海防要地,在保证国家海疆安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上起着重要作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屯门(今深圳南头)设镇驻军,稽查海防,保证海上丝路畅通。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第六首就有“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刘禹锡《踏潮歌》“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都描写屯门波涛汹涌的场景。南汉乃置屯门镇,杯渡山上《汉封瑞应山勒碑》石碑上写到:“汉乾和十一年,岁次甲寅,开翊卫指挥使同知、屯门镇检点、防遏右靖海都巡检陈巡,命工镌杯渡禅师像供养”^⑦。宋制,在今深圳南山设置屯门寨,在宝安区固戍村设立固戍角寨,在珠江口外设置望舶巡检司。元沿用以上两个军寨,改军寨为巡检司,大德时裁撤官福盐场改设官福巡检司(今香港境内),三司除了辅助参与辖区的行政管理之外,主要维护辖区的社会治安、搜捕盗贼,维护海上安全。可见,屯门镇为护卫海防、稽查关税的要塞所在^⑧。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立南海卫,治所在今深圳南头。下置经历司,在卫左;左、右、前、后四所在卫前;镇抚司在卫左。外隶东莞、大鹏、从化三守御千户所。至今深圳地域南头所在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成为隶属南海卫珠

江口以东重要的海防机构,是广东海防中路要隘。“尝考之三四月东南风汛,日本诸岛入寇,多自闽趋广。柘林为东路第一关镇,使先会兵守此,则可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越于中路之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而南头为甚。或泊以寄潮,或据为窠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东莞、大鹏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必不敢以泊此矣”^[12]。东莞(驻地南头)、大鹏在海防作用十分重要。“按广东省会,襟江带海;其东出海,则由虎头门;而虎头门之东,则为南头,省会之门户也……今既设南头参将、广海守备,控制于外;虎头门把总,防守于内;又总镇标下添设中权二部水军,以备策应,由今视昔,万一有不测之变,岂遂至束手哉”^[13]。大鹏所城将士与民众多次抵御倭寇、葡萄牙和英殖民者。明正德年间,大鹏所城士兵就跟随海道副使汪鏊参加了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西草湾战役,把葡萄牙人赶出了屯门一带;隆庆五年(1571年),大鹏所城军民在舍人康寿柏带领下,抗击倭寇40余日,击退倭寇。明末,大鹏所士兵在俞大猷率领下,出海剿灭倭寇。1839年,大鹏营将士在赖恩爵将军率领下,在九龙海战尖沙咀击退英军入侵,后又在官涌海战、第一次穿鼻洋海战中取得胜利。这些重要的历史事迹见证了深圳地区中国海疆安全与航行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中外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不断,是佛教海上南来首地、“辞沙”文化主要形成地和华侨华人的祖籍地

深圳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不断。这主要体现外来宗教及相关习俗的引入、“辞沙”文化的形成、华人华侨对深圳地区对外文化交流的促进等三个方面:

在宗教及相关习俗方面,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进入推动了中外文化相互融合。六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印度高僧杯渡禅师从海上来华,在宝安县作短暂停留,渡海在县城对面的羊坑山(后改名杯渡山,即今香港青山)居住长达58年之久。后这里称作杯渡庵,信徒们还在附近的灵渡山上修建灵渡寺、杯渡井^[14],这是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首地。此后,外来宗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从珠江口附近进入中国大陆,成为中外宗教文化相互交流的重地。除宗教外,深圳沿海的文化习

俗也与东南亚有关,如嚼槟榔、以槟榔为聘礼等风俗,最早也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15]。

在对外贸易往来方面,深圳地区形成了独特的“辞沙”文化。宋元时期,深圳地区来自域外的商人也多从望舶巡检司附近登岸。而深圳赤湾是明清中外使节“辞沙”之地,明代大量使节在天后宫祭祀完毕后,即登船离岸。上述永乐八年(1411年)中贵张源使暹罗,为答谢天妃庇佑于赤湾新建天妃庙。此后,天妃宫成为历代使臣出发广州“辞沙”之地。此外,庙宇辉煌还与官方使臣出还顺利有关。天顺四年(1460年)九月丙戌,命给事中王汝霖为正使,行人刘恕(《新安县志》作刘泰)为副使,“有占城之行,泊舟庙下,于神是祷,往返无虞,出钱二万缗”,让东莞知县建赤湾天妃庙正殿四楹,前殿易为享堂;天顺五年(1461年)三月戊午,给事中陈嘉猷、行人彭盛治舟再往满刺加行礼^[16]。来回顺通,为答谢天妃阴佑功绩,“复发钱万缗以相其事”^[17]。清代,“赤湾天后庙为省会藩篱之地,扼外洋要害之冲,护卫虎门、澳门,以作保障,汇东北诸海以为归宿”。南海诸国贡船“外而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番舶来贡,莫不经过于此。然后就岸望海,若有朝宗。荷慈航之,普渡功施不著,中外蒙庥”。乾隆初,南头商埠商人倪某捐资重修。嘉庆时,海寇猖獗,沿海遭殃,童都督等“官弁稽首祷祀于后,将事之日,乘风克敌,转舵登陴,士无伤残,民无瘴疠,守御三年,皆各安堵如故。惟神助顺,惟帝庸功,海氛荡平,海宇清晏”^[18]。而明代新安县人“张政,勇敢有干局”。弘治初,占城国乱。都御史屠鏞“檄募能谙海岛可使者,政往应,至占城,宣谕本朝威德,争据者咸服。还,给以冠带”^[19]。张政为明代中越关系做出了贡献。

在人员交流方面,深圳地区成为了我国著名的侨乡之地。从唐代开始,来自东南亚等地的“昆仑奴”就在岭南沿海地区出现,深圳所在的珠江口地区是其人员往来的必经之地。明清乃至近代,受战争和经济衰落的影响,大批居民飘洋出海到异国他乡创业谋生。深圳地区海外华侨有12万之多,分布在54个国家、地区。大规模华人华侨移民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期。这一时期以在香港做船员的宝安华工为主,主要移民美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及东南亚等,还有荷属西印度的乔利梳及亚鲁巴、非洲的尼日利亚和莫桑比克。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的宝安籍的华侨最多,达5万以上,他们在马来西亚种植橡胶、开采锡矿,为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0]。

综上所述,深圳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出发点的必经之地,与海上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注:

- ① 深圳地域曾经设立过宝安县、东莞县、新安县等,其所辖的地区包括今深圳十区及香港在内。本文研究的深圳,即为这一地域。
- ② 十三行由官府对外贸易代理人即官商组成,充当国内商家与外商的中间人,在当时具体的条件下,为广州乃至全国海外贸易发展和体制的转型做出过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94.
- [2] 王元林.唐代广州内外港与中外贸易交流[J].唐都研究,2006,(6):22-24.
- [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12.
- [4] 王元林.内联外接的商贸经济:岭南港口与腹地、海外交通关系研究[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2.
- [5] 宝安文史丛书编纂委员会.新安县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85-909.
- [6] (明)黄佐.广东通志[M].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1997.318-548.
- [7] 韩强.广府在古代中国外贸体制中的地位及其文化分析[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6):1-7.
- [8] (葡萄牙)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8.
- [9] 李庆新.明代屯门地区的海防与贸易[J].广东社会科学,2008,(2):90-97.
- [10] 深圳博物馆.深圳古代简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07.
- [11] 谭棣华等.广东碑刻集[C].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76-178.
- [12] (明)茅元仪.武备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505-555.
- [13] 王元林,邓敏锐.东南亚槟榔文化探析[J].世界民族.2005,(3):63-69.
- [14] 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六[M].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3.6730.
- [15] 姜蔚.深圳华工与华侨简况[A].深圳文史[C].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263-2.

【责任编辑:林莎】

Connection between Shenzhen Region and the Marine Silk Road in History

WANG Yuan-lin¹, XIONG Xue-ru²

(1.History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2.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Baoan District in Shenzhen, Shenzhen, Guangdong, 518600)

Abstract: In history, Shenzhen region was an important node along the Marine Silk Road. It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ad in economy, culture, military affairs, transportation,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The connection was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located i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great rivers and the sea, Shenzhen region was vital to the Marine Silk Road; with trade system constantly adjusted, Shenzhen region played a leading and pioneering role in Chinese foreign-trade system; Shenzhen region featured in marine economy with frequent exchang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odities; being an important garrison town, Shenzhen was essential to marine traffic and security; with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nstant cultural exchanges, Shenzhen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Buddhism from the sea. Besides, it is an important location for “Ci Sha (辞沙)” culture, and the ancestral homes for many overseas Chinese.

Key words: Shenzhen region; the Marine Silk Road; system of marine trad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odities